

通識頭條

第354期

I ♥ LIBERAL STUDIES

近代留學潮

為國儲才 變天開局



▲英國教育展在港舉行，吸引不少學生和家長參觀

留學，跟中國近百年來受列強入侵的歷史，脫不了關係。留學，就是承認己不如人，要到外國學習別人的長處。自古以來，中國都是國力最強盛，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國家，直至西方工業革命後，才被西方比了下去。是故，近代以前國人根本都不需要往外留學。

往外國留學，當然是希望能有較好的前途。純為追求知識而去留學，不計較前途的，只是少數。在以往的封建朝代，讀書人的前途就是考取功名、當官，那是用不着留學的。

風氣始於清末

由1872年至今，不少留學生都吡咤風雲，對中國歷史發展有重大的影響。中國第一個現代留學生是容闈，他可算是被迫往美國留學。他在珠海出生，被父親送到澳門的馬禮遜學堂讀書，皆因在那裡住、吃和讀書都不用錢。1847年，容闈被帶往美國，先讀預科，再考入耶魯大學，成為第一位耶魯畢業的中國留學生。1872年，他得清廷批准，組織30名12至15歲幼童赴美，之後還有三批，共120人。但到1881年，卻全部被召回國。縱使如此，這批學童當中已培養出不少人才，如唐紹儀、詹天佑等，對中國貢獻良多。

改革再掀留學潮

1877年，清廷再派出近百人往歐洲各國留學，嚴復是其中之一。甲午戰爭後，日本崛起，清廷官費派遣大批學生往日本留學。10年間，達5萬多人，是中國第一個留學潮。這些留學生不單人才輩出，數百人還成為辛亥革命的先鋒，如黃興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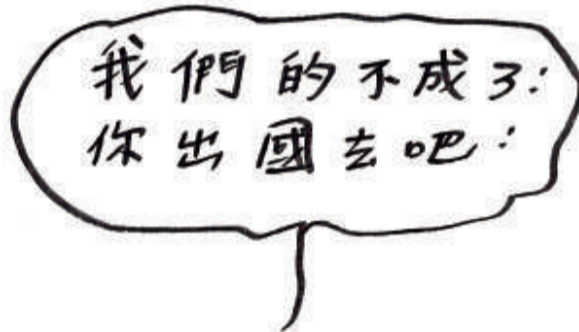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後，最重要及著名的留學潮，當然是1920年代往法國的「勤工儉學」潮。周恩來、鄧小平、徐悲鴻、錢三強、冼星海等等，對

中國歷史有重大影響的人物，都在這個時期去法國留學及工作。其次便是往蘇聯留學的一群：瞿秋白、劉少奇、葉劍英、楊尚昆、廖承志、蔣經國等，朱德和鄧小平亦從歐洲轉往蘇聯留學一段日子。此外，美國率先用庚子賠款，在中國成立清華大學，以及資助中國學生往美國留學。在台灣，直至1979年，仍有不少大學生受惠。這批留學生多是讀農、理、工等實用科學，但亦有胡適、趙元任等讀人文科。

1949年後，大陸只有往蘇聯及東歐的留學生。台灣學生則醉心往美國留學。香港呢？往英、美、加、澳、紐、歐洲世界各地留學的都有。1978年，鄧小平鼓吹增派留學生：「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開始了新一波留學潮。從1978年到2010年這30多年，中國留學生總數超過190萬人。

去年28萬人放洋冠全球

一般來說，留學是由落後到先進、由低水平往高水平的國家求學。美國是超級大國，因此，往外地留學學生的比例是最低的。中國大國崛起，各國都有人員來留學，至2010年總數達26萬人。在另一邊廂，中國學生負笈外國的潮流卻又方興未艾，2000年各類出國留學人數才不過接近4萬人，到2010年卻增至逾28萬人。每年，中國留學生佔全世界留學生人數15%以上，是最多學生出外留學的國家。背後是什麼原因呢？值得深思。（留學·一） 撰文：博文



知識點

清朝學生 留學 or 留辮

留學難，因要適應外地的語言、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甚至歧視的眼光。清朝第一代留學生，還要面對留不留辮子的兩難。留辮子會給人藐視——辮子被諷稱為「pigtail」。為此，有些留學生把辮子盤在頭頂，再戴一頂帽，盤像頭上一座山。受不了恥

笑的，索性把辮子剪掉，陳獨秀、魯迅在日本留學時便剪了辮子。但這樣做，可能被取消留學的官費。學成歸國，頭上沒辮會被視作「通外國」，甚至是「漢奸」或「革命黨」，又受恥笑。為此，連魯迅也不得不為在回國後，買條假辮子戴上。



幼齡放洋須防得不償失

梁文燕紀念中學（沙田） 高二 陸嘉敏

對很多家長而言，孩子是他們最大的財富。為把他們培養成龍、成鳳，費盡心血，甚至願意花光畢生積蓄。因此，為了給孩子更好學習環境，中國掀起了「留學潮」。

中學生出國留學熱何以興起，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一部分富裕的人，每年支付孩子數十萬元人民幣的留學費用不成問題。二是國內升學和就業競爭壓力大，中學生要面對中考、高考的激烈競爭，家長擔心孩子如果考不上重點中學，就會導致考不上好大學，最終影響就業和前途。三是教育市場國際化，外國學校看好中國市場。

無可否認，出國留學可以讓孩子學習不同的文化，擴闊眼界，而且一紙「洋文憑」

含金量較高。

但是，出國留學也有它的弊端。嚮往國外寬鬆、靈活的教育，同時，不能忽視的是：無論多麼先進的教育體系也無法取代家庭的教育和親情。家庭是孩子成長最重要、最親切的搖籃，過早送孩子出國學習，使孩子相當長時間生活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失去了父母的支持、監督與幫助，對其身心健康發展會有影響。此外，家長還要考慮文化環境的問題。十四五歲的孩子心智還不成熟，較容易融入異域文化中，又缺乏分辨是非的能力，若孩子的自控能力較差，意志薄弱，有可能誤入歧途。果真如此，豈不是得不償失？

通識我見

異國學習有助磨練意志

德雅中學 高二 盧美玉

自一百多年前，中國就有學生前往外國留學，學習其他國家的知識，因而為留學熱潮開了先河。百多年後，留學熱潮依然不絕，且變得越來越普遍。現時，出國留學不但已成趨勢，亦成為許多學生想追求的目標。

先撇開內地的情況不說，很多香港人都崇向出國留學的大趨勢，除了因為外國的名牌大學吸引外，還因為「浸過鹹水」的學生能得到的就業機會和待遇似乎比本地大學畢業生更有優勢。

大家有這種想法也不無道理，出外留學，不但能學習到課本上的知識，還能學習到該國的獨有文化，所以當留學生回國時，各公司都不惜高薪聘請他們，從他們身上取得國外的技能或新穎獨特的想法，以助公司的未來發展。

中國每年的留學人口數量佔全球15%之多，可能會衍生出這是否代表本國教育不及外國的問題。但本人則認為

這個想法有點多疑。本人認為出國留學，除了學習其他國家的風土文化、書本的知識之外，也是自我意志的磨練。到人生路不熟的地方，我們自然要激發起自我適應力。除此之外，在沒有父母的日常照顧下，還要學會自理起居飲食等等。所以我們出國留學所學的，豈會單單是國外的技術、國外的教學呢？況且，我覺得大部分父母選擇送子女出國念書的原因都離不開要他們學會自立，早點認識不同地方的風土人情，好讓他們早些脫離在溫室成長的幼嫩階段。

另一邊廂，有不少外國學生會選擇中國有名氣的學府入讀，或作交流生等等，所以中國的教育仍有其獨特、吸引及可取之處。即使多中國人外出留學，未必代表中國的教育比不上其他國家。

國家戰略首重培養人才



較早前有報道指日本留美人數比前減少35%，幾近是高峰期的一半，而由研究機構派往海外研習也出現同樣情況。日本也留意到，中國赴美赴日的留學生人數卻與年俱增。此現象使日本擔心國會因留學生減少而淪為二流國家。2010年度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岸野英一對此深感憂慮：「日本年輕人如果都沒有勇氣走出國門去海外留學，不僅日本整個科研水準將會下降，而且對「技術領先」的日本製造業也是一個巨大隱憂。日本將會變成科技領域的「發展中國家」。

目前，在美國的外國留學生總數達到歷史最高紀錄的69.1萬人。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為12.73萬人，超越了印度而躍居第一。反之，日本留美學生則只有2.48萬人，排名更在台灣之下。美國哈佛大學的外國留學生為663人，日本學生僅佔5人、中國36人、韓國42人。所以，日本的擔心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留學生留在異邦發展還是回國服務，成為人才消長的關鍵。在國家的《留學人員回國工作「十二

五」規劃》中，以更具體措施留住人才：「相關部門要以高層次貫徹「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拓寬留學管道、吸引人才回國、支持創新創業、鼓勵為國服務，積極應對國際人才競爭，努力開創留學回國工作新局面。」王輝耀著的《國家戰略——人才改變世界》（左圖）從國際人才競爭的趨勢出發，歸納和總結了當前發達國家、新興發達國家、新興發展中國家的人才競爭狀況、趨勢及規律，並就改進中國國際人才戰略提出了建議。「當今世界競爭的核心是人才的競爭，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國際人才競爭日漸成為決定各國走向世界命運的重要因素。」在過去改革開放30年間，中國是尖端科技人才流失量最大的國家。現在面對建設創新型國家、和諧社會以及提升經濟產業已經落實為戰略目標的需要，推動人才回國，競爭國際人才，便順理成爲國家未來發展的重點目標。

優質圖書館網絡主席 呂志剛 sidneylui@gmail.com



留日派對辛亥革命的影響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全國各地主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筆者近日翻閱趙雨樂教授的《文化中國的重構》（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6年）（右圖），發現他在書中討論了辛亥革命與留日學生的關係，從另一角度分析了革命爆發的原因。

百多年前的晚清，國勢積弱。知識分子急於向強國借鑒，找尋救國方案。清末中國留學生當中，以赴日本者居多，因此日本對中國近代化進程產生極爲深遠的影響。當時，日本明治維新進入全盛時期，中國留日學生認識到日本強大的軍事實力歸功於軍民上下團結的信念。他們相信中國自強之道必須從教育入手，重建適合中國國情的軍國民教育主義。1903年，軍國民教育會在日本創立，說明軍國民教育主義思想的勃發。軍國民教育之意在通過學校推行普及的軍事教育，使國民能盡軍民的基本責任，以利全國具備抵禦外侮的基本能力。1903年後，留日學生



陸續返國，並於所屬城鄉發展。由於留日學生就讀連成的私立學校居多，自身程度較低，投身於基層教育的情況相當普遍，形成1904年以後各省學校教職員大部分由留日師範生充任的現象。他們有助於地方貫輸軍國民教育思想，江蘇教育總會的成立即爲一例。

趙教授認爲近代中國革命思想，從孕育至發展成爲政治主張，涉及衆多思想的匯流。軍國民教育主義思想，是20世紀初留日學生的主流意識，在中國擴展成爲從教育入手的強國思想，最後成爲革命思想的一部分。

本書試從多個角度分析中國文化在近代的重構過程，以多位近代知識分子的改變爲研究對象；也探討了軍國民教育與近代中國的關係，從另一角度研究了辛亥革命，補充了這一段較少人關注的歷史片段。 香港通識教育會 李偉雄 henrilee@graduate.hku.hk